

社科研究文丛

走出时代的 困境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ZOUCHU
SHIDAI DE KUNJING

汪行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科研究文丛

走出时代的 困境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ZOUCHU
SHIDAI DE KUNJING

汪行福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汪行福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8

(学术研究文丛)

ISBN 7-80618-718-9

I. 走... II. 汪... III. 哈贝马斯-哲学思想-研究 IV. 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305 号

走出时代的困境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

著 者:汪行福

责任编辑:华 华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53060606 邮编 200020)

经 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1.5

插 页:2

字 数:273 千字

版 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3000

ISBN 7-80618-718-9/B·84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俞吾金

在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缘。有时候有缘,有时候则无缘。我与当代思想大师哈贝马斯及其思想的关系就处在这种有趣的状态之中。1988年冬季学期,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开设了题为“Aesthetische Theorien im 20. Jahrhundert”(《20世纪的美学理论》)的讨论班。当时,我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刚到哲学系报到,自然成了这个讨论班的常客。这不仅因为我对哈贝马斯心仪已久,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去感受大师的灵气,也因为美学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科之一。我猜想,一定有不少参与者怀着与我同样的心情走向教室。但有时候,慕名而来的人实在太多了,哲学系的小教室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于是,大家不得不转移到学校的大梯形教室去。此情此景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长达2年的留学生涯中,我差不多搜集了哈贝马斯已出版的全部著作。当时主要读了他的《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交往行为理论》)和《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和技术》),特别是后面一本书关系到我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所以读得比较细致。

1990年回国并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我开始把一部分精力转移到对哈贝马斯的研究上。我对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有着特别的兴趣,并应一家出版社之约开始翻译他的《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这本书是由 12 篇讲稿组成的,我已译出它的“前言”和第一个讲稿的第一、二部分,但繁忙的行政工作终于使我不得不搁下了笔。有趣的是,我的一位博士生,即本书的作者汪行福,他对哈贝马斯的哲学也怀有特别的兴趣。他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其学位论文就是研究哈贝马斯的。他从 1995 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起,就向我提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打算研究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我对他的想法非常支持,何况,《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也已有英译本,这就为他的研究工作铺平了道路。经过 3 年的艰苦努力,汪行福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在答辩时,他的论文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在我和另一位教授的推荐下,这篇论文获得了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赞助,很快就要面世了。当汪行福博士希望我为他的论文写序时,我欣然同意了。

有趣的是,1999 年,即在我初次见到哈贝马斯后的第十一个年头,已届 70 高龄的哈贝马斯,在经过好多年的犹豫之后,终于决定访问中国。大约 4 月初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当然很高兴。事实上,我们这里也已多次邀请他来访问,但由于各种原因,均未成行。我和那位朋友大致商定了哈贝马斯在复旦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讲学的日程。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也给我寄来了哈贝马斯在《时代》周刊 1999 年第 14 期(3 月 31 日)上发表的文章《Der Zeigefinger. Die Deutschen und ihr Denkmal》(《注意:德国人和他们的纪念物》),这是他为纪念推倒柏林墙十周年而写的,其中包含着他在政治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新思考。期盼已久的哈贝马斯的来访似乎已成定局,然而,好事多磨。在 4 月下旬,我突然得到消息,由于身体不适,哈贝马斯已在医生的劝告下放弃了这次出访的机会,并把对中国的访问无限期地推迟了。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卡夫

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他希望进入城堡中,但实际上他一直围绕着城堡在兜圈子。哈贝马斯也希望进入中国,但除了他的著作和思想外,他本人则始终在外面徘徊。他是否愿意再向命运索取类似的机遇呢?换言之,我们是否有缘在中国再见到他呢?我们不得而知。

在感叹命运之神奇和缘之悭吝之后,我们不得不使自己的注意力重新返回到汪行福博士的论文所探讨的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上。为什么哈贝马斯要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来?按照他自己在《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前言”中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了回应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新结构主义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批判,因为这一批判在公众意识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1979年)中提出的“后现代性”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哈贝马斯写道:“因此,我尝试着从由新结构主义的理性批判引发的挑战所构成的视角出发,渐渐地形成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演讲。在这一演讲中所涉及的现代性问题,从18世纪后期起已经被提升为一个哲学课题。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常常关涉到美学问题,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一课题必须加以限定,我这里的讲座并不涉及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①这段话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特别受到新结构主义的影响;第二,现代性作为哲学问题始于18世纪后期;第三,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不涉及到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显然,作这样明确的限定是必要的,因为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它和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之间不但存在着内涵上的差异,也存在着时间差。当然,它

^①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第7页。

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所以,哈贝马斯指出:“关于现代性的根据问题最初是在美学批判的领域里被意识到的。……虽然‘现代性’这一名词(它总是与一对反义的形容词‘古代的’和‘现代的’一起出现)在古代的后期已经在编年史的意义上被使用,但在欧洲新时代的语言中,形容词‘现代的’(modern)的形成是很晚的,大约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而且它最初出现在美的艺术的领域里。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现代性’(Moderne)、“现代性”(Modernität)和‘现代性’(modernité)这样的表述形式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美学上的核心意义,而这方面的意义正是通过对先锋派艺术的自我领悟而产生出来的”。^①

在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12个演讲中,前面4个演讲是于1983年3月在巴黎的法兰西学院做的。其余则是在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和波士顿学院做的。与此同时,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也开设了同样的讲座。这使他关于现代性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他第五讲“神话的纠缠和启蒙: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内容来看,哈贝马斯关注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深层动因是:试图通过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超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等著作中把社会批判理论引向单纯的批判和否定的悲观主义的倾向,重振社会批判理论和德国理性主义传统的雄风。

那么,现代性问题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呢?哈贝马斯的论述是从韦伯意识到的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合理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的。“马克斯·韦伯不仅从合理化的观点出发论述了西方文化的世俗化,更重要的是论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新的社会

^①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第16—17页。

结构是通过那些双重功能交织在一起的制度形成起来的,而那些制度又是从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的组织核心的周围结晶出来的。韦伯把这一行为理解为目的合理的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在这样的范围内,这种文化的和社会的合理化的日常生活被把握住了,而那些传统的、在近代初期首先表现为职业等级差异的生活形式则已经自行解体了。但是,生活世界的现代化不仅仅是通过目的合理性的结构来确定的。杜克海姆(E. Durkheim)和米德(G. H. Mead)已经发现,合理化的生活世界是通过一种愈益趋向反思性的、并已失去了其质朴性传统的交往而产生出来的;通过行为规范和价值的普遍化,交往行为从限定的、狭隘的前后联系中摆脱出来,进入更宽泛的选择游戏的空间中;最后,通过各种社会化的模式,着眼于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的培养并大大地促进了人的成长的个体化。正如社会理论方面的经典作者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这大致上就是现代性问题的图像。”^①这段话表明:第一,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合理化问题。第二,现代性问题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被韦伯揭示出来的,即现代社会在文化上和社会制度上的合理化;另一个侧面是被杜克海姆和米德揭示出来的,即现代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主要是在新的交往行为以及与此行为相关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的导向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把这两个不同侧面合起来也就构成了现代性问题的全部内容;第三,杜克海姆和米德关于交往行为理论的见解对哈贝马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种理论中,他找到了超越韦伯关于目的合理的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扬弃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抗衡后现代主义和新结构主义对现代性的非难的重要理

^①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第9—10页。

论武器。

在搞清楚现代性的本质含义之后,我们还要继续追问:现代性和人们通常使用的“现代化”(Modernisierung)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和区别呢?哈贝马斯写道:“‘现代化’这个词是在50年代作为专门术语被引进来的。从那时候起,它标志着一个理论上的开端,即人们已接受了马克斯·韦伯的课题,但是人们是以社会科学的功能主义作手段来探讨这个课题的。现代化的概念涉及到一系列积累起来的、彼此之间不断强化的过程:资本构成和资源转化为资金;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中心权力的实施和民族认同性的培养;政治参与权、优雅的生活方式和程序化的学校教育的扩展;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现代化的理论赋予韦伯的‘现代性’概念以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抽象,它把现代性与其新时代的一欧洲的起源分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对一般社会发展过程来说在时空上都中性化的模式。此外,它以现代化过程不再作为能被把握的合理化(即对理性结构的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化)的方式破坏了现代性和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连贯性之间的相互关系。”^①在这段重要的论述中,哈贝马斯告诉我们:第一,现代化概念是在本世纪50年代起才被提出来的,因而比起现代性来,它是一个比较晚出的概念;第二,现代化的概念也是在韦伯思想的背景下形成的,但这一概念主要是按照功能主义的思路被阐释出来的,这种阐释方法已为现代化和现代性两个概念的分离乃至对立埋下了根子;第三,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等方面的有序化和世俗化;第四,通过功能主义的阐释,把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对立起来了,并进而把只体现经济、技术和国家功能的现代化与失去了理

^① 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演讲》,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5年德文版,第11页。

性主义传统的现代性对立起来了。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化概念的出现以及它与现代性概念的对立是导致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上面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最基本观点作一回顾,目的是为了论述它的意义,尤其是它对正在从事现代化事业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换言之,我真正关心的是,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哈贝马斯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处境获得了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国家,其现代化的进程处在一个巨大的历史错位中。19世纪后半叶,当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重要性时,西方国家已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国知识分子歧路亡羊,最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当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能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导向死胡同,从而提出了现代化的口号的时候,西方已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主导价值进行批判。在当代中国,前现代的(即传统的)价值体系、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纷然杂陈,我们应当作何选择?哈贝马斯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坚持现代性的价值体系,但又必须从前现代的价值体系,特别是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吸取合理的因素,以便不断地完善现代性的价值体系,用以指导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其次,哈贝马斯使我们意识到必须认真地反思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对这一关系进行协调。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则是现代性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常常会出现差异。比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但这种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又是从传统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后来的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脱胎出来并发展起来的,所以其根

本特征是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由此而引起了现代化实际进程的畸变,并使这种进程与通过现代性表现出来的现代化的理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一方面,要从现代性出发,对现代化的实际进程进行批评性的检视;另一方面,又要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越出传统的现代性视野的东西吸纳进来,不断地丰富现代性的内涵。如果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不能实现动态的协调,那么前现代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和后现代主义的价值体系必然会应势而起,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再次,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为我们重新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的含义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人的简朴生活通常是以实用理性为指导的,比如,“无事不登三宝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惯常的说法都体现出这种理性的无处不在。这种注重实用的理性本身已蕴含着把他人和周围的一切都视为工具的强烈意向。随着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行政管理方式的改变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工具理性在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这种工具理性的发生是必然的,它在经济行为、管理行为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渗透,必然导致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人的贬值和人文价值的失落。在这个意义上,工具理性批判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

第四,在对现代性的诊断中,哈贝马斯强调,应“把研究的焦点从认识的一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kognitiv-instrumentellen zur kommunikativen Rationalität)。^①这表明,他力图通过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两分来丰富理性概念的内涵,并通过对交往理性地位的高扬来重建理性的尊严。虽然交往行

^①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8年德文版,第525页。

为理论不是哈贝马斯首创的，他实际上受到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米德等人的重大影响，虽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不少人的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这种理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无法加以实现的乌托邦，但无论如何，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强调沟通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的重要性，是有普世性意义的，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我们一定会特别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概念的“道”的初始含义就是路，而路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通达。“道”的含义也衍化为“说”。老子说，“道可道”，这里的第二个“道”就是“说”的意思，而“说”也就是沟通。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释“道”的过程中，把“道”仅仅解释为“规律”，从而忽略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道”的两个基本的含义。由于这种阐释方式，中国哲学文化中的“道”的精神陨落了，实用性的、知性的思维方式占了主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恢复“道”的初始的、基本的含义和精神，不但要重视对各种传统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进行改革，从而疏通各方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疏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视市民社会的建设、民法的制定、新闻法的出台、道德行为规范的确立、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等方面的工作。可以断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是与道的伟大精神的恢复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对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意义作了简略的分析之后，让我们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汪行福博士的论文上来。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对他的论文内容再做什么评价，如前所述，这种评价早就已经由答辩委员会做出了，读者也可以通过对他的文本的解读，自行做出判断。我在这里感兴趣的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研究方法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他善于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来，锲而不舍地长期研

究同一个课题。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哈贝马斯的。尽管从他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对与哈贝马斯同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都能作出准确的评论,从而表明他的涉猎是很广泛的,但他还是严格地区分了了解的领域和研究的领域,牢牢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的领域里。我们常常见到一些青年学者自恃聪明而试图把一切领域都转化为自己的研究领域,这样做当然只能是在一切领域中都浅尝辄止。滥用聪明的结果是使生命和智慧都成了碎片。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的,懂得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情都想做的人,实际上什么事都做不成而最终归于失败。世界上有许多有趣味的东西:西班牙诗、化学、政治,音乐都很有趣味,假如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感兴趣,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不。但在特定的环境内,一个人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①在哲学研究中,缺乏的也正是这种专注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当然,研究者也可以转移自己的研究领域,但必须是在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之后。浅尝辄止是任何研究工作的大敌。

第二,他善于在叙述中把哈贝马斯的思想和他自己对哈贝马斯思想的理解区分开来。尽管诠释学告诉我们,在对任何一个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时,要完全撇开我们自己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存在着无数个孔子或海德格尔。然而,在叙述中尽量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博士论文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使你无法判断他叙述的究竟是他研究的对象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混淆不单纯是一个叙述方式的问题,而

^① 《黑格尔全集》第8卷,苏尔卡姆帕出版社1986年德文版,第170页。

且也是一个理解问题,表明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和批判的能力,以致于还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对象的思想严格地区分开来。

第三,他善于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做到“走进去,又走出来”。所谓“走进去”,就是读懂所要研究的文本,并把这些文本的内容融贯起来。所谓“走出来”,就是对所研究的对象保持一种批判的意识。他的论文的结束语“谁之现代性,谁之启蒙”集中表述了他自己对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批评性的见解。实际上,当人们解读一篇博士论文的时候,最关注的正是作者自己的见解。但我们常常见到,不少博士论文“走进去”了,却没有“走出来”。研究尼采,就崇拜尼采;研究胡塞尔,就崇拜胡塞尔。总之,研究什么,就消失在什么中,至多引证别的批评家的话做一些表面文章,从而给人留下“大山分娩,生出来的竟是老鼠”的印象。当然,提倡批评意识并不是做无病呻吟的文章,归根到底还是要读懂文本,对对象作出切实的批评。

总之,汪行福博士的论文有自己的特点,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他论文中涉及到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大多是通过他们与哈贝马斯之间的对话或争论展现出来的,这里关注的面还不够宽,对哈贝马斯置身于其中的时代虽有一定的分析,但语焉不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哈贝马斯理论形象的完整性。此外,他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中国理论界研究哈贝马斯的现状及这一研究本身的意义。我相信,作者在今后还会把这些未竟的工作继续坚持下去。

是为序。

Abstract

J. Habermas' theory of modernity has been becoming a focus of debate in intellectual circle in the west. Since the 1980's, Habermas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theme of modernity. He is aware of the challenges to the ideal of modernity from the theoretic world as well as the realist political life.

The post structuralism and new conservatism think modernity is obsolescent, and history is going to post-modern age. But Habermas thinks these two theories would not only ruin the fruits of post-WW II social reform, but also extinguish the faint fires of human hope.

Habermas believes that modernity is not a thing that we can give up at will. Although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has its defeats, it has the rational potentiality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human liberation.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o insist on it or give it up, but to find a new way of its self-reassurance and find the new power to realize itself.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ubject, which relies on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can not provide satisfiectional justification for modernity. The idea of modernity in the philosophy of consciousness is doomed to self-destruction. Only by turning to communicative reason, can we find the new foundation for modernity, overcome internal self contradiction of modernity and provide a sol-

id basis for the ideal of self-knowledge,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Habermas divides actions into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purposive action. Communication re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of language, while purposive action relies on the effect of action. Communication provides mechanism of social integration, while purposive and strategically action provides mechanism of systemic integration. We can find the premises for the concilia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late capitalism, Habermas thinks the mechanism of systemic integration takes the pla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depending of the lifeworld and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ce of the society, hence resulting in the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 By this diagnosis of modernity, Habermas concludes that we must reconstruct a strong political publics to control th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s by public democracy, in this way can we accomplish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目 录

序	俞吾金
导言	1
第一章 启蒙与现代性	27
第一节 现代性意识的诞生	27
第二节 现代性与理性批判	39
第三节 公共理性与政治的合法性	45
第四节 从理性的反思到现代性的反思	51
第二章 黑格尔与现代性的辩证法	56
第一节 辩证的现代性意识的产生	56
第二节 主观理性的困境与绝对精神的超越	59
第三节 市民社会的困境与伦理国家的重建	71
第四节 黑格尔哲学的终结和现代性话语的分流	79
第三章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86
第一节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规范基础	86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内在批判和实践超越	92
第三节 物化和现代性批判	97
第四节 劳动乌托邦和现代性	105
第四章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	114
第一节 现代性的轨迹	114
第二节 合理化的悖论	122
第三节 工具理性批判	131
第四节 现代性与《启蒙辩证法》	138